

浙江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沙勿略在亚洲的传教活动及其文化意义的分析

姓名：田茹晶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外国哲学

指导教师：戚印平

20060501

沙勿略在亚洲的传教活动及其文化意义的分析

摘要

弗朗西斯科·沙勿略 (Xavier, Francisco, 1506-1552) 是耶稣会亚洲传教活动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他大胆实践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对于后来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来说,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在他的传教生涯中,精力旺盛的沙勿略历巡索科特拉岛、印度的果阿、马六甲、安汶岛、摩洛加群岛和日本等地,为基督教在东方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1622年,被教皇格里高里15世封为“传教圣人”。

在基督教东传史的研究上,国内学者对沙勿略的关注不多,而比较重视开创了在中国传教事业的耶稣会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 国外学者对沙勿略的研究大都从教会史角度出发,夸大其神迹。本文从具体史实出发,关注沙勿略传教的历史情境,联系传教地各自不同的具体环境,从客观的角度,对沙勿略的传教经历及其传教方法进行分析定位。

我们认为:沙勿略因地制宜的传教方法,勇于开拓的传教精神和异常狂热的宗教情怀,在亚洲耶稣会史上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一意义主要表现在,审时度势,根据不同的环境,不断修正并调整传教策略,有效地利用各种政治经济力量,在平衡利益同时,为传教的最终目的服务。他的这一传教方式为后来的“文化适应政策” (policy of adaptation to national customs) 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因此,忽略了这段历史,将无法对耶稣会在远东传教的完整历史做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

沙勿略 天主教 耶稣会 传教

Abstract

Xavier Francisco was the founder and the pioneer of the Jesuit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Asia. For the subsequent Jesuit missionary activities, his spirit of bold in creation and courageous in practice is of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In his missionary career, Xavier had gone through the Socotra Island, India Goa, Malacca, Amboina, Moro and Japan. He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for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st. Pope Grigori 15th denominated him as "Missionary Saint." in 1622.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East, the domestic scholars pay less attention to Xavier, but more attention to Matteo Ricci who initiate the missionary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most foreign scholars make the study of Xavi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church, as a result they exaggerate his magic. Based on the specific facts of the history, while with the concern of the respective specific environment of his missionary work, this paper try to make the analysis of Xavier's missionary experience and methods from an objective perspective.

We believe that his missionary approach which adjusted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the courage of exploit, and his unusual religious fanaticism have made special and great sense in the history of Asia Jesuit. The key point of the great sense is: sizing up the situation, depending on the environment, he took a flexible strategy and use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effectively, and balanced different interests to achieve the final missionary purposes. His methods played a basic role for the subsequent cultural adaptation policies. Therefore, ignoring the history will be unable to make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to the whole Jesuit missionary history in the Far East.

Keywords:

Xavier Francisco, Catholicism, Jesuit, missionize

弗朗西斯科·沙勿略 (Xavier, Francisco, 1506-1552) 图像



导言

耶稣会天主教东传史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其意义不亚于地理大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天主教的东传，世界拉开了一体化进程的序幕，它使得东方人逐步了解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天主教所信仰的神（Deus）具有怎样的性质和意义；也使得西方人逐步认识亚洲、尤其是远东各国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就此而言，天主教传播过程中的交流、融通、磨擦、甚至是尖锐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为此后东西方不同文明体系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也正因为如此，以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的宗教传播与文化冲突，才应当成为考察中国近代史以及世界近代史不可忽缺的研究对象。

从天主教东传史的角度看，沙勿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他是这个修会的创始人之一，更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在亚洲传教的耶稣会士，是耶稣会亚洲传教活动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但是，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我国学者更多的关注利玛窦（Matteo Ricci）的传教策略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礼仪之争”，而很少顾及沙勿略。许多著述在提到沙勿略时，也只是将他在上川岛的失败冒险视为中国天主教史的短暂序幕。诚然，我们不能否定利玛窦向中国介绍西方宗教文化与学术思想的重要贡献，但也不能因此而忽略沙勿略在整个天主教东传史中的特殊作用。我们从沙勿略的信件中可以看到，他每到一个新的传教地之前，都会通过各种方法，对当地的社会状况，自然风物、宗教信仰等情况进行了解，然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探索不同的传教方法；在投身于下一个传教地之前，他还会对前面的传教成果加以总结，对已有的传教方式加以修正。而这些独创性的工作，对此后利玛窦等人的传教实践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事实表明，无论是利玛窦的以科学知识为媒介的传教策略、还是自上而下的主要传教对象，都不是他自己的独创，通观耶稣会士在亚洲的传教经历，我们很容易发现，利玛窦的许多行为方式，都源于沙勿略最初的探索。正如他自己所言，“这就是他获得的成功秘诀所在”。^①

基于不同的视角，外国学者对于沙勿略的研究数量极多，^②但通过仔细研读，

^①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第23页。

^② 比较著名的有：I，《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II，《The Life of St. Francis Xavier,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Apostle of the Indies and of Japan》，Written in French by Father Dominick Bobours, of the same Societ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Mr. Drrden, London; III, Josef Franz Schutte, S.J.: valignano's mission principles for Japan, Translated by John J. Coyne, S.J.; James Brodrick, S.J.: IV，《The Origin of the Jesuits》，Longmans, Green and Co., London, New York, Toronto.; V, Resumo historico da Vida do Glorioso S. Francisco Xavier, apostolo, defensor, e patrono das Indias; VI, Bellessort, Andre: 《L'Apotre des Indes et du Japaon Saint Francois Xavier》, Paris, Perrin, 1918; VII, Castner, Gaspar: Relatio sepulturae magno Orientis apostolo S. Francisco, Xauerio erectae in Insula Sanciano anno saeculari MDCC, Macau, s. n.; VIII, 许汗默（Schur Hammer）：《沙勿略

便可以发现其间取舍和详略各有不同，叙述的角度和语气更有区别，或通篇阐述其神迹，或语焉不详。而其中大量教会学者的著作，则基于宣传的政治目的，突出、甚至夸张其传播福音的圣徒经历和传奇神迹。例如，在由鲍勃斯神父(Bobours, Father Dominick)所写的沙勿略传记中，作者满怀景仰地讴歌道：“是神意赋予了沙勿略作为一个传教士必需的所有天生素质，并选择他让如此多的人改宗。沙勿略体质强壮，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他精力充沛，拥有崇高的精神和一流的创造力；他的心是大胆无畏的，这也体现在了他的行为当中。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那就是：快乐，服从，好胜以及强烈的求知欲。”^①作为一名教会学者，鲍勃斯神父的描述当然会包含着强烈的宗教色彩和宣教的主观意图，我们不能一概否定上述对沙勿略的所有评价，但作为严肃的学者、我们显然不能完全采信国外学者的著述，而必须联系沙勿略所处的社会情境，通过分析他的心理旅程，考察其行为方式的内在含意，对沙勿略的传教经历做出实事求是的恰当评价。进而由此及彼，研究伴随着宗教传播过程中的文化交流模式，用以指导应对当下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

研究》，1922；IX，博乌尔：《沙勿略传记》，1682年版；X，科莱利热：《沙勿略传记》，1872年版。

^① 《The Life of St. Francis Xavier,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Apostle of the Indies and of Japan》,Written in French by Father Dominick Bobours, of the same Societ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Mr. Drrden, London, p3-4.

第一章 年青时代

1.1 出身贵族

1506年4月7日，沙勿略出生在纳瓦拉王国（现法西边境）的沙勿略城。出于对阿西西圣者方济各的景仰之情，他受洗时取的教名是弗朗西斯科，故后人以弗朗西斯科·沙勿略（Xavier, Francis）作为他的全名。

沙勿略出身名门，他的祖父阿尔纳德曾担任王子的财务官，与阿顿特领主的女儿结婚后获得贵族身份，随后历任财务大臣和王室会议议员。父亲胡安·汉斯（Juan de Jassu）是博洛尼亚大学的教会法博士，并曾一度担任王室会议议长的高位，并因此得到伊德西的领地。其母玛丽亚·阿斯匹利奎塔（Maria de Azpilcueta）出身于纳瓦拉望族阿斯皮利奎塔，其远祖为巴斯克地区士族后裔。沙勿略城就是她的嫁妆，其父亲去世后，又兼领家族的其他三块领地。

沙勿略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共育有三男二女，沙勿略是他们最小的儿子。他的大姐在他出生前就已经辞去卡斯蒂利亚女王侍女一职，加入甘迪亚的克拉拉修会，后来成为修道院的院长。二姐安娜在沙勿略六岁时，出嫁贝拉领主。在沙勿略的幼年，主要与年长11岁的大哥米盖尔、二哥胡安一起长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比母亲小16岁的姨母比奥拉特家族的关系，另一个对沙勿略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是马尔奇·阿斯庇尔库塔。这个人称纳瓦拉博士的长者在当时最著名的教会法教授，后曾担任罗马教皇的顾问。沙勿略一直梦想着成为他那样的圣职人员，并在加入耶稣会后还与他保持通信联系。

1.2 巴黎求学

1525年夏末，沙勿略前往巴黎，在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就读于巴黎大学最著名的巴巴拉学院。在最初的预科学习中，他先后学习了拉丁文、辩论术，数学、几何、天文、音乐，语法、修辞学和伦理学，随后又进入更高一级的哲学课程，先后读完神学、法学和医学的专业课程，于1530年3月15日获得哲学修士的学位，并开始在其他学院中教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在巴巴拉学院读书期间，沙勿略认识了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依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依纳爵年长沙勿略15岁，出生于1491年，是13位兄弟中最小的一位，在潘普洛纳城之战中受脚伤后，开始苦读《基督传》，并

在曼雷萨村的洞窟进行苦修，并将其一年的体验写成了《灵操》一书。1529年进入巴黎大学，成为沙勿略的室友。在他的影响下，沙勿略打消了获得博士学位荣归故里的想法，决心成为一名圣职人员，为耶稣基督献身。

1534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沙勿略与依纳爵、佩德罗·法佩尔、西蒙·罗德里格斯、迪亚哥·纳莱斯、阿·方索·萨曼罗、蒙巴特里在巴黎蒙巴特高地的教堂中，立下清贫、贞节和巡礼圣地的誓愿，并在依纳爵的指导下进行了灵修。

1.3 谒见葡王，获得传教许可

1536年11月15日，沙勿略等人从巴黎出发，前往威尼斯。翌年4月3日，谒见教皇保罗三世，请求叙阶与巡礼圣地。6月24日，沙勿略及其六位同伴在圣保罗大教堂被叙阶，9月30日在维琴察作了首次弥撒。此后，依纳爵又面见教皇，请求前往全世界传播福音。1540年9月27日，在葡萄牙国王等人的帮助下，耶稣会终于获得正式认可，并确定了清贫、贞节和顺从的《会宪要纲》。1541年，葡萄牙国王若阿三世为使其印度殖民地的土著居民改宗，授意葡萄牙大使，要求依纳爵派遣前往印度的传教士。

最初，被选定的人是葡萄牙贵族罗德里格斯（Simon Rodrigues）和波旁迪里，但后者自那波里返回时患热病无法成行。于是，当时担任依纳爵秘书的沙勿略成为不二人选。随后，被委任为教皇使节的沙勿略与罗德里格斯一起随葡萄牙大使前往里斯本，由于后者被国王留在了里斯本，担任他私人的忏悔司祭，最后真正前往印度的耶稣会士只有沙勿略及其随从。从此，沙勿略开始了长达12年的传教之旅。在随后几年中，精力旺盛的沙勿略历巡索科特拉岛、印度的果阿、马六甲、安汶岛、摩洛加群岛和日本等地，为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1552年12月3日，沙勿略在寻机进入中国内地时，因病死于广东沿海的上川岛。1622年，被教皇格里高里15世封为“传教圣人”。

第二章 印度的传教历程

2.1 途经小岛，首遇异教徒

沙勿略在印度的传教时间是他整个传教经历中最长的一段，在他到达印度之后的 8 年内，他不断地往返于印度以及南亚群岛之间，近乎疯狂地收获他的传教成果。

1541 年 4 月 7 日，被委任为教皇使节的沙勿略随葡萄牙新任总督卡斯帕尔·索萨 (Sousa, Gaspar de)，乘坐名为圣迪戈号的旗舰，^①于里斯本扬帆出海，沿着当年达伽玛发现印度的航线，前往遥远东方的印度传教。而这一天，恰好也是沙勿略 35 岁的生日。

船上有许多船员、旅客、士兵，沙勿略没有放过这个传教的机会，他给众人讲解要理，每主日在甲板讲道，侍候病人，将自己的卧室改成诊疗室。当时，海上风浪很大，沙勿略常患晕船病，所以他的工作倍加吃力。船上的人形形色色，每天都有争吵发生，沙勿略就给他们排解矛盾，劝说他们戒绝发虚誓和赌博的恶习。在漫长的航程中，几乎全体旅客都患了败血症。三位耶稣会士一天到晚忙着照顾病人。

绕过非洲好望角，他们的船在 1541 年 8 月底到达了非洲南部的莫桑比克，^②当时那里正值冬天。到了 1542 年 2 月底，沙勿略把两名同伴留在莫桑比克照顾病患，他同新指派的印度总督卡斯帕尔·索萨起航前往果阿了。

在去往果阿的途中，他们路过了居住着摩尔人^③的城市麦林德 (Melinde)，^④大部分时间那里都有葡萄牙商人，摩尔人是当地的土著人，也是异教徒，其中很多属于默罕默德教派。在这里，沙勿略第一次遇到了异教徒的提问，他在 1542 年 9 月 20 日从果阿写给在罗马同伴的信中提到：

麦林德城的一位非常有威严的摩尔人让我告诉他，是否我们经常去教堂做祷告，我们是不是对做祷告非常有热情，因为，正如他告诉我的，他们自己已经失去了很多的热情和虔诚，所以他想知道这种事情是否也一样发生在基督徒当中；

^① 这支舰队由 5 艘船只组成，由于当时每年均有这样一支舰队前往东方，它们又被称为定期航船。这些葡萄牙商船在东方的主要交易货物有胡椒、丁香、肉桂、白银、珍珠、各种宝石以及名闻世界的中国丝绸和陶器。

^② 自从达伽玛开辟新航线以来，莫桑比克一直是葡萄牙远东船队的中转站，他们通常在这里休整半年左右，治疗病人、补充淡水和给养，然后利用下一次季风，重新航行。

^③ 指非洲西北部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 (Berber) 的混血后代，公元 8 世纪成为伊斯兰教徒，进入并统治西班牙。

^④ Melinde，现在为“Malindi”，在肯尼亚，蒙巴萨岛的南边。参见《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47, 注 12。

另外，在城中有 17 座清真寺，但是只有三座还在开放，而且没有多少人去那里。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失去热情和虔诚，所以他感到很困惑。他告诉我，这一定是很大的罪恶导致的。在交谈了很长时间之后，我们还是保持各自的观点。我告诉他，主对异教徒以及他们很少祷告的行为不满意，这也就是上帝为什么让他们的祈祷停止的原因。可是他对我的解释并不满意。默罕默德教派的一个很有学识的摩尔人，也是住在城中的一位教师，他告诉我，如果默罕默德在两年内不派人来探访他们的话，他将不再相信他或者是他的学派。^①

离开了麦林德城，沙勿略等人继续前往印度的旅程，来到了一个由 25 到 30 个联盟组成的大岛——索科特拉 (Socotra)， “这是一块贫穷的、被遗弃的陆地，它不出产小麦，大米，玉米，酒或者水果；并且那里非常的干燥和贫瘠。可是那里有很多的海枣和棕榈树，他们就从这些植物中获得食物。这个岛屿上还有大量的禽类，人们就以牛奶，海枣和肉类为食”。^②沙勿略在信中对索科特拉城的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岛上的气候非常炎热。岛上的人们相信自己就是基督徒，并且他们也声称自己是。很明显，他们为自己能有基督徒这个称号而感到非常骄傲。这是一群无知的人，他们不知道怎样读和写；他们既没有书籍，也没有任何著作。但是他们却以称自己为基督徒而骄傲，他们也有自己的教堂，十字架和油灯。每一个村庄都有它自己的酋长，就像我们的牧师。同样，这些酋长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没有书籍也没有著作。这些酋长在心中记得很多祈祷文，他们一天去四次教堂——午夜，清晨，黄昏和傍晚。他们没有摇铃，他们通过拍手掌来召集人们。因为酋长们不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背诵祈祷文，所以他们并不明白意思。我记录下二到三个他们背诵的祈祷文。他们热衷于使徒圣多玛，并认为自己是这些地区由使徒圣多玛改宗的基督徒的后代。酋长并不施行洗礼，并且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施行洗礼。^③

在索科特拉期间，沙勿略给很多孩子施行了洗礼。虽然当地都是没有文化的土著人，可在那里的传教并非一帆风顺，沙勿略也遇到了不接受基督教和洗礼等一些礼仪的摩尔族异教徒。^④

^①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47.

^② 1542 年 9 月 20 日从果阿写给在罗马的同伴的信。《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48.

^③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48.

^④ 在那个村庄，有一个摩尔族女人，她有两个小儿子。因为沙勿略不知道他们是摩尔人的后代，所以希望能给他们施行洗礼。可是他们跑开了，跑到他们妈妈身边，告诉她有人想要给他们施行洗礼。这位摩尔女人眼泪汪汪的来到沙勿略身边，请求他不要给她的儿子们实行洗礼，因为她是一个摩尔人，并不想成为基督徒，即使她的儿子们也是这样。这个地方的基督徒告诉沙勿略，在这里他绝不应该为他们施行洗礼，即

我们不确定那个时候沙勿略是如何回答摩尔人的，但当时的沙勿略的确还没有比较好的、成熟的方法来应对异教徒，也不肯定自己所采用的传教方法是否合适，他在同样的一封信中说道：

以为主服务的名义，请一定要写信给我，告诉我如何处理我所面对的异教徒和摩尔人的计划，我希望主能通过你让我知道，在使异教徒改宗的过程中我应该遵循怎样的计划。在等待这封回信期间我所犯的错误，我希望能通过你的信察觉到，并在以后改正。^①

2.2 果阿传教

离开了索科特拉岛，沙勿略等人乘船绕着东非洲海岸，于1542年5月6日到达印度南部的果阿。^②总计这次海上的航程，历时十三个月。果阿自1510年由葡萄牙管理，主要由葡萄牙国王任命的副王、总督进行统治，是葡萄牙在印度最主要的殖民据点。来自四面八方的各国商人以及远征士兵，使该城成为亚洲最为繁华的大都市。在17世纪初期的极盛期，其人口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不相上下，被称为“东方的罗马”。虽然当地教务很发达，城中到处都有教堂、修院，可是许多人对宗教没有深刻的认识，领圣事不大踊跃，很多远离家乡的葡萄牙人不仅另外娶妻，而且还购买了数名女奴，供其享用。他们甚至抛弃了原来的信仰，在这里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

沙勿略到了果阿，住在了当地的医院。他在拜访了当地主教之后，便开始为病人以及当地居民服务。第一件工作就是灌输宗教知识，激励教徒热心敬主，过标准教徒生活。他每天上午前往医院、监狱探视病人和囚犯，倾听他们的忏悔，并给他们发放圣餐；下午在街头召集儿童和奴仆，给他们讲解要理。

事实上，到达印度之后，选择去医院为病人服务算是沙勿略的一个无奈之举。因为，当时印度的果阿是主教区，作为主教区，一定拥有各种完备的设施，有主教座教堂，神学院，医院，也有主教和助理，可以说教务发达。而沙勿略是在去中国之前才成为印度管区长的，他在刚到印度时，只是个不为人知的年青传教士，级别比较低，并不像有些传记资料中提到的那样被重视。所以沙勿略在初到果阿时只能选择去医院，连其他的神学院都去不了。

便是他们的母亲要求这样做也不可以，因为他们摩尔人很反对成为基督徒；并且他们也拒绝成为基督徒。而这些基督徒对摩尔人也非常的敌视。引自1542年9月20日从果阿写给在罗马的同伴的信件，《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49.

^①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51.

^② 因为当时正值季风，所以沙勿略无法乘船到达他被指派去的地方——印度南部的渔夫海岸。

在果阿，与所有的殖民地一样，由于远离家乡以及文化观念的大交汇，当地居民道德沦丧与财富增加的速度同样迅速。为了改变这一情况，他向葡萄牙人布道说教，指导儿童和当地的土著改宗，为此他改编了包括十戒、使徒信经和基本祈祷词在内的《小公教要理书》（《Christian Doctrine》）。^①事实上，此书最初是作为一部面向儿童的语法书的附录。正如作者序中所说的那样，这本小册子不仅是为葡萄牙本国人所作，而且亦面向居住在印度的葡萄牙儿童以及那里的印度信徒。^②沙勿略在 1540 年受葡萄牙国王若阿三世的委托前往葡属印度传教时，他从国王那里接受了此书的大量刊本，并在 1542 年 5 月将它们带到东方，用于教义的宣讲与传播。在印度传教期间，沙勿略根据当地的情况和教义传播的轻重缓急，对《小公教要理书》作了一些修改。他删去了一些拉丁语祷文，增加了一些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教理条文，将它作为在印度、摩洛哥群岛以及马六甲等地传教的主要依据。

2.3 传教土著居民

沙勿略没有只停留在果阿工作，他还深入到了欧洲人所未到过的印度腹地——各个村庄进行传教。1542 年 10 月，沙勿略前往离果阿 200 里格的渔夫海岸，在这个伊斯兰教徒与葡萄牙人正在争夺的地区传播福音。沙勿略在第二年 11 月返回果阿后不久，又于 1544 年 2 月再次来到这里，由于当地的一个王公与葡萄牙总督订立了盟约，沙勿略得以在一个月中为将近 10000 名土著人授洗。^③自此，渔夫海岸成为印度基督徒最多、教会影响最为广泛的地区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沙勿略在一个月中洗礼 10000 人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洗礼是基督教第一大圣事，在普通的洗礼仪式中，需要倒水与诵经同时进行，且两个动作需要由一个人完成，也就是说，洗礼是非常庄重而神圣的宗教仪式，需

^① 这本书是沙勿略在 1542 年编写的，它在 1557 年于果阿被首次印刷，沙勿略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对教义原文做了一些改变。沙勿略在印度和摩洛哥群岛传教时使用的《小公教教理书》，是改编自巴洛苏为本国儿童撰定的教义小册子，即《葡萄牙语文法及神圣的、如同母亲的教会的教义》（*Grammatica de lingua Portuguesa com os mandamentos da santa madre igreja Lisboa*, 1539）。参见龟井孝、切希里克、小岛幸枝：《日本耶稣会版基督教要理书》，岩波书店，1983，第 12 页。转引自威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211-212 页。

^② 《日本耶稣会版基督教要理书》，第 12 页。参见威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212 页以及注 1。

^③ 洗礼（Baptism）是基督教入教仪式。基督教认为，耶稣基督订立的洗礼圣事，一经完成，就赦免了领受人的“原罪”和“本罪”，并赋予“恩宠”和“印号”，而经过洗礼的人才算是正式教徒。洗礼是圣事中的第一项，只有经过洗礼的人，此后才有资格领受其他“圣事”。基督教会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三种不同的授洗方式，即浸水洗、注水洗和洒水洗。目前，注水礼成为洗礼仪式的主要形式。注水礼（*Infusion*）仪式是主礼者（一般为神父或牧师）给受洗者额头（或身体其他部位）倾注少量的水，让水从额头流下，同时口诵规定的经文。洗礼不管采用何种方式，都需要与授洗的经文配合，在时间上不能脱节，即不能先倒水后念经，或先念经而后倒水，要念经与倒水两个动作连贯进行，且只可一人施行，不能由两人分别进行。否则，圣洗无效。参见康志杰：《基督教的礼仪节日》，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沙勿略在一个月内洗礼 10000 人的话，他每天要授洗 300 多人，如果这些过程又严格按照宗教仪式的过程进行的话，显然是做不到的。沙勿略很可能是只给一个地方的首领授洗，于是，这个地方的土著居民也就都随之成为基督徒了。这也是沙勿略在传教土著人时所常用的方法，在土著人聚居的部落，通常由首领决定其所管辖土著人的一切，因此沙勿略只须说服首领信仰基督教，就可以成功地使整个部落改宗。很明显，这是一个简洁、有效而又能快速收获大量成果的传教方法。

每到一地方，沙勿略都给那里所有没被洗礼的孩子授洗，他“还给那些连自己的左手和右手都分不清楚的幼儿施行了洗礼”。他发现，在很多基督徒村庄中，由于没有人在宗教信仰上对村里的基督徒进行指导，所以他们只能说出自己是基督徒，而对其他事情一无所知。没有人为他们做弥撒，更没有人教授他们有关教义，主耶稣，圣母玛利亚以及戒律等知识。为了使当地的基督徒以及不识字的文盲易于记忆基本教理，沙勿略将要理用通俗的文字编成诗赋体的歌曲，教大家唱。

沙勿略在印度期间，不停地奔波于各个不同的地方——有些是基督徒村庄，有些是异教徒村庄，还有些是土著人村落。通常，沙勿略不会在一个地方呆很长时间，每当在一个村庄初有成效时，他便会留下一个人在村庄里，继续做他开始所做的事情，转而投身访问其他村庄，“并且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传教”。^①在沙勿略经过的村庄，他都留下了祈祷文，并要求那些会写字的人抄录副本，用心记牢，每天背诵。沙勿略还告诉他们，在周末所有的祈祷文该怎样背诵，并且在村庄里安排人监督所有事情能够按要求完成。

我们知道，在征服以及管理殖民地方面，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这主要是由两国的军事力量、人口数量等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相对于西班牙来说，葡萄牙人口少，能够派驻殖民地进进行统治管理的人员也就相当有限。因此，占领一个殖民地后，葡萄牙的做法是：在沿海地区建立首府，征收税款，就像建立自己的桥头堡。由于人力资源的缺乏，它无力大面积地深入某一地区进行管理和统治，所以通常葡萄牙的殖民地都只是沿海很小的一块区域。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印度的教务发达，但也仅限于果阿地区，主教和神父们都在传播福音。还没有人能够深入到村庄中，对土著人进行传教，在这些地区比较有组织的传教活动是在十七世纪才开始的。由此看来，沙勿略能够只身去到充满着未知，甚至是危险的土著人村庄传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虽然，沙勿略这样做很可能是由于当时的他还只是没有地位的小传教士，在教务发达的果阿无法完全发挥出他狂热的传教热情，去村庄中传教土著人很可能是他的被迫之举，也是一种无意识的

^① 1544 年 1 月 15 日，从科钦写给罗马的同伴的信件。引自《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67.

做法；但是，这样的行动却使得他迈出了耶稣会传教崭新而具有开创性的一步。

除了授洗，听取忏悔，编写要理书等传教活动外，沙勿略在传教地另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翻译——将祈祷文翻译成当地语言，以便于当地的人们更好地理解基督教教义。他在 1544 年 1 月 15 日，从科钦写给罗马同伴的信中提到：

我把那些知识渊博的人聚集起来，找出既懂我们的语言又懂他们的语言的人。经过了很多天非常辛苦的劳动，他们帮助我将祈祷文从拉丁文翻译成马拉巴文（Malabar）。祈祷文以十字架标志为开头，宣称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接下来是信条，戒律，耶稣基督，圣母玛丽亚，以及悔罪书。在我把这些全部翻译成他们的语言并深深的记在心里之后，我已经走遍了整个村庄，^①为了能够召集尽量多的大人和小孩，我随时带一只摇铃在身边。人群聚集之后，我每天布教两次。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教会了他们祈祷文，并要求这些孩子们把他们在学校里学的东西教给他们的爸爸，妈妈，以及家里的所有人和他们的邻居。^②

将祈祷文翻译成传教地语言以及对学习当地语言的重视，是沙勿略传教获得成功的关键一点。这使得传教活动不再是单纯的授洗，口头上成为基督徒；而是在基督教神学思想以及教义方面对新入教的教徒进行灌输，从而使他们在思想上领受神意，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虽然，当时这样做的效果未必立竿见影，内容也未必真正被当地土著所接受，但却是传教方法上的进步，它使得传教士们意识到了语言在传教中的重要作用。

沙勿略的这种传教方法对后来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甚至是东西方文化交流都影响巨大，他们由此了解到，掌握传教地语言对于尽快了解当地文化，从而更快、更顺利地进行传教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利玛窦在进入中国之后便努力学习中国语言，研习中文诗书，这对他尽快地了解中国文化，找到适当的传教方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其中，沙勿略在传教方法上的探索和开创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2.4 模仿耶稣

沙勿略的传教方法中，有一些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沙勿略刚到果阿便采取在街头、集市传教，他会手里拿着一只铃铛，大家一听见铃声，就出来围住他。沙勿略就给他们解释信德道理，教他们诵念经文。他每主日召集麻风病人，举行弥

^① Tuticorin. 引自《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65, 注 8.

^②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64.

撒圣祭。他也向印度人传扬福音。除了公开讲道外，还常到他们家里作个别访问。在1542年10月28日，沙勿略写给罗马的依纳爵·罗耀拉的信中提到：

沿着路一直走，我来到了一个没有基督徒的村庄，尽管他们的邻居已经改宗，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还是不愿意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们是一位异教徒君主的奴仆，而这位君主并不希望他们成为基督徒。村庄里有一个孕妇已经三天都处于即将分娩的痛苦中了，很多人都绝望了，以为她将要死去；并且，由于异教徒的祈祷令上帝不悦，因此所有异教徒的神都成了恶魔，他们的祈祷没有被上帝听到或看到。我和与我一起来的神父来到了这位正处于分娩中的可怜女人的家。当我走进她家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开始求助于伟大的耶稣基督，我没有去考虑我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而是相信这个地球和它的丰富性，相信世界和它所有的居民都属于上帝；于是，我开始背诵教义和祷告我主耶稣，我的同伴把我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语言；通过神的帮助，这个孕妇开始逐渐相信我所列举的宗教信条。我问她，想不想成为基督徒。她回答我说，她全心全意地希望能成为基督徒。听到她这样说，我便开始在房间里大声诵读《福音书》，我想当地的人们从来没有听到过；随后，我又替她施行了洗礼。洗礼后，由于她确信不疑地期望和信任基督耶稣，她顺利地生下了孩子。我还替她的丈夫，儿子和女儿们，新出生的婴儿以及房间里所有人施行了洗礼。后来，上帝在这个房间里创造的奇迹传遍了整个村庄。^①

随后，沙勿略找到了村庄的长者们，询问他们，是否能以上帝的名义信仰耶稣基督——独自拯救了人类的上帝之子。后来，村里的长者带着他们的家属一起接受了洗礼；在他们成为基督徒后，这里大小村庄的人们都接受了洗礼。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沙勿略36岁，正值体力和精力都很旺盛的青壮年，作为一名虔诚、狂热的信徒，来到这样一个陌生而又看似充满收获果实希望的地方，必然心潮澎湃，满怀着大干一场的劲头。此时，沙勿略所使用的传教方法，一定是他认为最有权威，最神圣而又最有效的方法。那么，从召集麻风病人和拯治孕妇这两个事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沙勿略是在模仿《圣经》中耶稣的做法。

在《圣经》《新约全书》的《马太福音》中，就有耶稣“洁净麻风病人”的故事：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祀察看，献上摩西

^①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61.引文中提到的“没有基督徒的村庄”，它的位置不确定。居住着 Careas 人，和 Paravas 人是同族。它在 Kayalpattanam 的东南面。现在只有纪念圣斯蒂芬（St. Stephen）的小教堂了。参见《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61, 注 11.

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作证据。”^①

另外，《马太福音》中也有耶稣“治好睚鲁女儿和血漏妇女”的故事：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耶稣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缝子，因为她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她，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来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个地方。^②

果阿当地人口众多，病患也就多种多样，但是沙勿略每逢主日只召集麻风病人做弥撒圣祭，又单单选择将死的孕妇去祈祷医治，整个过程与耶稣的做法非常相似，甚至一些细节也被注意到，其巧合性大得令人惊讶。例如，沙勿略曾问那名妇女，想不想成为基督徒，后来“由于她确信不疑地期望和信任基督耶稣”，才顺利地生下了孩子；这与耶稣所说的“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如出一辙。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沙勿略是特地在做这些事情，甚至是特地制造相似的情境来做这些事情，其模仿痕迹可见一斑，也能看出这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做法，而且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沙勿略不仅模仿《圣经》中耶稣的做法，并且还特地把这些事情写进了信件中。沙勿略在传教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必然千差万别，他会将哪些事情写进信件中绝非一时兴起，信手拈来；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有选择性地，有目的地，甚至是有功利性地将他认为能产生一定效果的、特定的事件写进信中。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写给罗耀拉，写给葡萄牙国王，还是写给耶稣会其他同伴的信件都将可能在修会中传阅，更重要的是这些信件会向人们昭示他外方传教的成果。那么，如果在信件中读到和耶稣基督做法相类似的传教事迹以及传教结果，耶稣会士以及上层主教们心中会产生怎样的震惊，沙勿略当然可能想象得到，这也无疑会在他的传教成果中画上神圣而又浓重的一笔。

2.5 提议更改四旬斋日期

之所以说沙勿略是一个开创性的人物，是因为他的很多传教方法以及应对新问题时的处理办法都被后来的耶稣会士有意识地延用了。很多问题在沙勿略阶段都已经表现出来，一些我们熟知的传教方式，如“文化适应政策”，^③都可以从沙

^① 《圣经》，新标准修订版，简化字和合本，中国基督教两会，2000，《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3页。

^② 《圣经》，新标准修订版，简化字和合本，中国基督教两会，2000，《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7页。

^③ 这里的“文化适应政策”，采用高濂弘一郎提出的“适应主义”的概念。高濂对此所作的解释是：耶稣

勿略的某些做法中找到源头。他虽然没有后人所总结的“合儒”、“补儒”等明确的做法，也没有系统的、成熟的传教方法，他只是在遇到问题时临时做改变，而事实上每一个改变都是一次“适应”。这些改变一条一条地加起来对后世影响巨大，也是开先例的。

在果阿传教期间，沙勿略曾经就改变四旬斋^①日期一事征求罗耀拉的意见。他在1542年9月20日从果阿写给罗耀拉的信中说道：

我应该让你知道当你那里是夏天的时候，这里是冬天；而当你那里是冬天的时候，这里又是夏天。也就是说，恰恰和罗马是相反的。在这里过夏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天气非常的炎热，热到水里的鱼一旦被捕获杀后，马上就会腐烂。在夏天的时候，这里的人们通常会驾船航行到其他地方；但是没有人会在冬天这样做，因为冬天的海洋非常可怕并时常有暴风雨。在四旬斋期间，所有的士兵都和舰队一起在海面上，商人们都不停的乘船从一个地方航行到另一个地方，以出售他们的商品，因为在这里，人们不是土地的主人而仅仅是海洋的主人，他们只能以贸易为生。由于这里极其炎热的天气和人们只在这个季节航行的事实，所以当地的人们既不以斋戒的形式，也不以禁食肉类的形式来庆祝四旬斋。总督已经告诉我写信给你解释这件事情，并且以热爱主、为主服务的名义上，认真地询问你，如果可能的话，你能否接受将四旬斋调到另外一个时间——也就是人们不在出海航行，商人们也不在跨海经商的时节。这将会是在六月和七月，因为在这两个月正值冬天，天气不再炎热，人们也不再出海航行。在那个温度适宜的季节里，很多人都会做斋戒和禁食肉类，人们会忏悔他们的罪恶，并接受圣餐礼，所以，在六月和七月庆祝四旬斋会比现在更合适。因为这是一件与为主服务有关的重要的事情，又因为他从没看过任何人实施过这样的措施，所以总督热切地希望您以关心主的名义尽力做您所能做的事。^②

会士具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性质，并与之密切相关。他们承认日本的政治体制与身份制度，并采取与之相适应得布教政策。参见高濂弘一郎：《基督教的世纪》，岩波书店1593年版，第105页。转引自戚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1页。

^① 四旬斋，即四旬期，是指复活节（逾越节）前的40天的准备期。在这一段时间内，基督徒要进行特别祈祷、守斋，所以这一时期又称为“封斋期”。40天的斋期又称为“大斋节（Lent）”、“封斋节”。这是以斋节为宗旨的节日。据《新约圣经》记载：耶稣在开始传教前曾在旷野守斋祈祷。教会为表示纪念，规定棕枝主日前的40天为此节期。教徒在此期间一般于星期五守大斋和小斋。节期内教堂祭台上不供花，教徒不举行婚配，娱乐活动也相应停止。大斋节的第一日称为大斋首日（Ash-Wednesday），在复活节前40天（星期三）举行，从即日起开始守斋。此日教堂内常举行祝圣“圣灰”和擦圣灰礼：并将已祝圣的树木灰搽在信徒额上，以示思罪或忏悔，也象征着人的生命的脆弱与短暂，故亦称“圣灰礼日”或“灰的星期三”。其后，市四旬期主日和四旬期平日。主日举行弥撒，因而平日的“礼仪”趋向淡化，只举行聚会，读经等活动，主题是悔改和洗礼。四旬期的后期是苦难期和圣周。苦难期一般在四旬期的最后两周。复活节（Easter），基督教第二大节日，以纪念耶稣“复活”。据《圣经·福音书》记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后第3日“复活”，这一天是“七日的头一日”（即安息日的日一天），因此基督教把这一天称为“主日”。尼西亚宗教会议规定了复活节的时间，即每年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如果月圆的这一天正好是“主日”，则复活节顺延一周），一般在3月21日至4月25日之间。因此四旬斋应该在2月至3月之间。参见康志杰：《基督教的礼仪节日》，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②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1548年，几年的传教经验使沙勿略知道这样一个改变并非必须。他在1548年1月20日从柯钦写给罗耀拉的信中又提到：

关于四旬斋，通过几年的传教经验，我已经知道没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变。因为，在印度的葡萄牙人都居住在互相距离很远的不同地方，所以没有必要改变任何有关圣祭的事情，也就是说，葡萄牙人所居住的城市和村镇的冬天并不在同一时刻来到。尽管我知道并不缺乏其他的不同想法，但是，我认为时刻想着圣祭会更好，而不需要决定做出其他新的措施。^①

虽然这次改革并没有真正地实施起来，但是，从最初沙勿略根据当地的情况提出改变四旬斋日期的措施，到后来通过几年的传教经验知道没有改变的必要，可以看出，沙勿略所面临的境遇是前人所未面临过的，所有的方法都是他在黑暗中不断摸索出来的，甚至是无数次碰壁才得出的结论。

他已能够根据当地的具体状况做出适时、适当地改变，而非盲目地、原封不动地将基督教的礼仪节日等方面的规定搬到传教地。这种改变，甚至是试图改变的初衷，也可以称作是一种适应。虽然这可能是无奈地选择，但是，无奈之下却能选择改变，恰恰体现了适应对方的倾向。这正是沙勿略传教经历的可贵之处。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58.

^①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82.

第三章 马六甲及南亚群岛的传教历程

3.1 马六甲

1545年8月，沙勿略准备穿越孟加拉湾和马六甲海峡，前往望加锡岛（Macassar）。^①他在去望加锡岛之前，对岛上的情况有了一定地了解，在1545年11月10日沙勿略从马六甲写给他欧洲同伴的信中，他说道：

望加锡岛已经有两位国王成为基督徒了。望加锡岛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距离果阿大约有一千多里格。来自那里的人们说，望加锡岛已经准备好改宗信仰基督教，因为那里没有任何可以鼓励异教信仰的寺庙，无论是供奉神像还是供奉人物。他们崇拜太阳，但是他们没有其他的敬神活动了。那里的人们经常处于互相战争之中。^②

可是，沙勿略没能顺利到达他期望中能够获得丰厚传教成果的望加锡岛，由于季风，他中途停靠在了马六甲。于是，在1545年9月末，沙勿略首次踏上了马六甲的土地，开创了他又一个崭新的传教基地。

马六甲在孟加拉的旁边，面对着大半岛的顶部，它一直向南面延伸，几乎到了赤道线；马六甲高于海拔2.5度，在苏门答腊岛对面。在那个时候，没有比马六甲更著名的商业中心了，那里就是各个国家的大汇集。因为，除了马拉巴尔海岸（印度西南部的沿海地区）的人，苏门答腊岛（在印尼西部）人，爪哇人在那里做贸易，摩洛哥群岛的人们，阿拉伯人，波斯人，中国人以及日本人都都在那里经商贸易；所以，为了方便贸易，马六甲整个城镇都是沿着海岸线一直延伸下去的。

在所有亚洲国家里，没有一个比马六甲这个国家更快乐的了，而且由于这里温和宜人的气候，这种快乐的状态似乎要一直继续下去。尽管马六甲临近赤道线，但是那里四季如春。马六甲的居民完全按照他们本性的爱好生活；香料，宴会和音乐是他们全部的事业；不用去说肉欲上的快乐，他们在生活上就过得无拘无束。就连他们所说的语言也构成了这个国家柔和的一部分。这种语言被称为“马来亚口音”，在所有的东方语言中，它是发音上最优雅和最悦耳的语言。

^① 或译孟加锡；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西南岸港市乌戎潘（Udjung Pandang）的旧称。

^②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29. 印文中的“两位国王”，指 Dom Luis, Supa 地区的国王；Dom Joao, Siao 地区的国王。引文中提到的“崇拜太阳”，是指西里伯斯岛（印尼苏拉威西岛之旧称）西部的人们崇拜太阳，从17世纪开始，Supa 和 Siao 王国就已经是穆斯林教的了。参见《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29, 注2和注6。

1511年，阿方索·德·阿尔布奎克（Don Alphonso Albuquerque）征服了马六甲。在第二轮攻击中，马六甲被葡萄牙人强迫占领，少数马拉巴尔人支持了葡萄牙人。沙勿略一上岸就去拜访了马六甲城的总督，告知他自己即将航行去望加锡岛的计划。总督告诉他，最近他已经派一位牧师和一些葡萄牙士兵前往望加锡岛了；他希望能尽快听到他们的消息。同时，总督还有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他希望沙勿略和他的同伴能够暂时呆在马六甲，直到他充分了解目前望加锡岛基督徒的状况再走。沙勿略相信了总督的话，暂时呆在了马六甲，回到了他暂居的医院。

沙勿略在马六甲的那段时间里，从没有停止过传播福音的工作。在1545年11月10日，沙勿略从马六甲写给欧洲同伴的信中，他写到：

自从到达了马六甲——一个拥有很多海上贸易的城市，我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神圣的工作。每个周日我都在大教堂布道，但是我布道时所获得的快乐却远比不上那些耐心听我布道的人所获得的快乐多。每天，我花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教授孩子们祈祷文。目前，我住在医院，每天给病人做告解。我为他们做弥撒，并给他们发圣餐。我太忙了，以至于不能听取他们所有人的忏悔。最主要的工作应该是，将拉丁文的祈祷文翻译成望加锡岛人能理解的语言，但是，目前还不了解他们的语言这件事使我非常地烦恼。^①

沙勿略发现，在马六甲城里，人们的行为举止极其地腐败堕落。这些生活在远离印度总督和主教的马六甲城里的葡萄牙人，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普通居民，都无视法规，犯下了各种罪行。贪婪，放纵，肮脏，疏忽上帝这样的行为在任何地方都很普遍；仅仅是他们的习惯，或者是那些无节制的恶习就足以区分开基督徒和异教徒了。这个罪孽深重的城市的状况使得沙勿略意识到，他很有必要留在马六甲，并且很可能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

在他准备对这个到处都腐坏的城市采取改革之前，他利用几天的时间照顾病患，很多个夜晚，他都是在祈祷中度过，并履行了极其严苛的苦行。在这些准备之后，沙勿略根据他在果阿经常使用的方法开始了公开传教。傍晚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摇铃来到街上，大声地喊着，祈祷上帝拯救那些极度罪恶的人。街头传教，授洗儿童，做告解，编写要理书等等，这些都是沙勿略使用的传统传教方法，也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所惯用的传统方法。因为，抛去其它的政治、经济因素先不考虑，这些方法的确使沙勿略先前的传教活动获得了一定成功，那么，它们理所

^①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29.引文中提到的“大教堂”是指圣母升天大教堂，位于马六甲城西北部的要塞和河流的附近。参见《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29, 注8.

当然地成为他在下一个传教地所使用的方法，因为，每一个传教地的传教方法都是下一个地方传教方法的标杆。

3.2 安汶岛及马鲁古群岛

虽然沙勿略一心想去望加锡岛传教，甚至还在马六甲做起了翻译的准备工作，但是事情却没有如他期望的那样发展。他在1545年12月16日，从马六甲写给果阿同伴的信中说：“我给你写信说我即将乘船去望加锡岛，但是从那里传来的消息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我没有办法去那里了；我将要乘船去安汶岛（Amboina），^①那里有很多的基督徒，并且很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基督徒。”^②

我们不知道致使沙勿略在望加锡岛的传教活动没能成行的具体原因，但我们却知道沙勿略不会停下他传教的脚步。作为传教士，沙勿略是一个不知疲倦却缺乏坚韧精神的使徒，他具有极其旺盛的精力和狂热的传教激情，他总是毫不顾忌地扔下初具规模和成果的传教区，转而投身于新的冒险。正如埃德蒙·帕里斯（Edmond Paris）所指出的：“说实在话，正像人们所正确评价的那样，首先应当把他看作是一个先行者，一个鼓动者，其次才是一个实践者。他热心，积极，总是在寻找新的行动领域。他更多的是指引道路，其次才是开拓阵地。”^③

尽管马六甲的“混乱”、“堕落”使得沙勿略觉得有必要留下来，可是或许那里还不是沙勿略心中理想的传教地，或许是因为过于旺盛的宗教激情与传播福音的使命感迫使他无法停下自己的脚步，总之，当他知道不能去望加锡岛之后，便毫不迟疑地奔向下一个传教地——安汶岛（Amboina），开始新的冒险。沙勿略在1545年1月1日离开马六甲，前往安汶岛传教。

在1548年1月20日，沙勿略从科钦写给罗马同伴的信件中，对安汶岛的情况进行了描述，他写道：

安汶岛距离马鲁古城（Maluco）有大约六十里格。葡萄牙国王在那里建有一个要塞，目前那里居住着葡萄牙人。除了马鲁古群岛和那些不产丁香的其他岛屿，葡萄牙人统治着岛上所有产丁香的土地。^④

在安汶岛三个月的滞留期间，沙勿略巡访了七个村庄，并为七艘葡萄牙商船

^① 安汶岛，在摩洛加群岛的南边。

^②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33.

^③ [法]埃德蒙·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57页。

^④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69. 引文中的“马鲁古城”，即特尔纳特岛（Ternate）：印度尼西亚东部一岛屿，位于西里伯斯岛东北以西、摩鹿加群岛北部的岛屿。开始为葡萄牙所占领（1521-1574年），1683年被荷兰人征服。参见《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69，注2。

和来自于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做宗教服务。他在同一封信中，说道：“我在安汶岛逗留了三个月，在这里我发现了很多基督徒村庄。在安汶岛的那段时间里，我给很多由于没有牧师而没得到洗礼的婴儿施行了洗礼；岛上曾经有一个牧师照顾他们，但是在很多年前死去了。”^①

三个月过去后，那七艘商船离开安汶岛，启航前往葡属印度了。沙勿略也再一次踏上了他的传教之旅——前往马鲁古群岛（Maluco）。^②沙勿略在马鲁古呆了三个月，^③ 1548年1月20日，从科钦写给罗马同伴的信中，他说道，

在马鲁古城的这段时间里，每主日和所有的宗教节日期间我都忙于布道宣教，并且不停的听取忏悔。每天，我都会教孩子们和那些刚刚改宗的基督徒们《小公教要理书》（Christian Doctrine）。每逢主日和宗教节日，早餐后，我会对那些新入教者布道，给他们讲授有关教义的内容。这样，我在法定主日布道两次，一次是在弥撒期间给葡萄牙人布道，另一次是在早餐后给新入教者布道。^④

传教士的传教工作并非是单纯的传授教义等神圣活动，它的成败与否经常和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紧密联系。传教士需要具备敏锐的眼光和灵活的头脑，他们必须能够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调和各方的矛盾，这样才能更快地取得传教的成功。沙勿略在马鲁古群岛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在1548年1月20日，从科钦写给罗马同伴的信件中说道：

马鲁古国王是一个摩尔族人，并且臣属于葡萄牙国王——能够这样，他自己感到非常骄傲；当他谈到葡萄牙国王时，他会称他为“葡萄牙国王，我的领主”。这位马鲁古国王葡萄牙语说得非常好。马鲁古群岛的各个主要岛屿都是摩尔人的。马鲁古不挨着任何山脉，主要是由岛屿组成。马鲁古国王没有能够成为一名基督徒，并不是因为他想献身于默罕默德，而是因为他不想放弃淫荡的恶习。他自己保留下来的全部摩尔人的习惯就是，在他年幼时被割包皮；而当他长大之后，

^①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 169. 引文中的“三个月”是指从1546年2月14日到6月。

^② 沙勿略大概在6月13日启航离开安汶岛，大约于7月份到达马鲁古。

^③ 从1546年7月初到9月初或9月中旬，在同年11月份又重返马鲁古，于1547年初返回马六甲。

^④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70. 引文中提到的“新入教者”是指，沙勿略在马鲁古城遇到的这些基督徒，一部分是马鲁古当地人，一部分来自西里伯斯岛（Celebes, 印尼苏拉威西岛之旧称，位于赤道婆罗洲东部、印度尼西亚中部的不规则形状的岛屿。葡萄牙人于1512年首先登上西里伯岛，但在17世纪初被荷兰人赶出。该岛因其稀有的动物品种而著名）。另外一些，是来自不同地区的葡萄牙人的仆人。1538年，Francisco de Castro 已经从棉兰老岛（Mindanao, 或译民大那峨岛，菲律宾东南部一岛屿，位于婆罗洲东北。该岛西边界为棉兰老海）带来很多孩子到马鲁古城，棉兰老岛是由Galvao总督管理的，这些孩子在基督教信仰方面得到了坚持不懈地指导。一些葡萄牙人也和棉兰老岛的女人结了婚。参见《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70, 注16。

他结了100次婚，因此他有100个主要的妻子以及很多其他次要阶级的女人。这些地区的摩尔人并不遵从默罕默德教派的教义；这里有一些伊斯兰教神学家，但是他们几乎都是外国人，并且没有什么知识。^①

他还在同一封信中提到：马鲁古国王对我非常地友好，因为他统治领域内的摩尔族酋长们并不喜欢他。他希望能和我成为朋友，并给我一些他最终能成为基督徒的希望……当我拜访他的时候，他非常地高兴，可是我一直没能使他成为基督徒。他答应我，如果他能成为所有摩尔人岛屿的国王，他就会让他众多儿子中的一个成为基督徒。从现在起的四个月内，印度总督将会把国王所需要的所有资料都送来，这样他的儿子在成为基督徒后，就能够成为摩尔群岛的国王。^②

沙勿略试图运用在印度渔夫海岸传教时使用的事半功倍的办法——面向统治阶级传教。首先使当地国王受洗，成为基督徒，进而使整个马鲁古地区的人民改宗。虽然这个设想最后没能实现，但沙勿略在国王没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毫不犹豫地撤回了教令，也恰恰说明了他对形势果断而犀利的认识。沙勿略作为一个传教士，能够灵活地周旋于政治势力和传教活动之间，主动利用政治力量来换取传教成果，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对后来耶稣会士传教活动的影响非常的重大；并且这一方法在那些没有多少文化传统、政权松散的土邦国家里是非常适用的。它反映了沙勿略对传教地政治环境的清醒而理智的判断，以及他敏锐的政治头脑。虽然在这里，我们强调了沙勿略个人在整个传教活动中的特殊作用，但不代表忽视当时特定的历史大环境，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如果没有政治势力和经济力量，即皇权和商人们的参与，没有他们的利益驱使，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3.3 摩洛哥群岛

1546年9月，沙勿略再一次踏上冒险之旅——前往摩洛哥群岛传教。这一次的冒险异于往常，因为，当时的摩洛哥群岛是一片野蛮的土地，那里多为异教徒，时有野人出没，当地部落里的人异常凶残狠毒，甚至以杀人为乐；并且，当

^①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74.引文中提到的“默罕默德”，是指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先知，四十岁时开始作为真正的宗教的上帝的先知传教。穆罕默德在公元622年以后在麦地那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国家并使阿拉伯半岛皈依伊斯兰教。引文中提到的“100个主要的妻子”，是指当国王年老时，他有100个妻子，其中包括他的女仆人，国王拒绝成为基督徒的原因就是 he 不想改正他的生活方式。一般来说，马鲁古国王能供养多少妻子，他们就会娶多少妻子。参见《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74, 注44。

^② 后来，这位国王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因此沙勿略撤回了帮助他儿子的教令。参见《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75, 注47。

地的自然状况十分恶劣，地震、火山时有爆发。在特尔纳特城，沙勿略就曾经听说过有关摩洛哥群岛的传闻，正是由于了解到那里恶劣的宗教环境，沙勿略才决定前去传教的，当他的同伴们得知他的决定后，做了各种努力试图劝阻他，他们声泪交加地列出了很多的理由，以说明摩洛哥群岛并非适合传教之地。但是，沙勿略对自己的决定十分笃定，他很清楚自己将要踏上一块“恶魔之地”，甚至有可能丧生于此地，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足可见其“唐吉诃德式”的宗教狂热。

在1548年1月20日，沙勿略从科钦写给罗马的同伴的信件中，对摩洛哥群岛的情况进行了描述，他写道：

三个月过去后，我离开了马鲁古城，来到了摩洛哥群岛（摩洛哥族，居住在菲律宾南部，多为伊斯兰教教徒，以制造武器闻名），距离马鲁古城有60里格，那里有很多基督徒村落。由于摩洛哥群岛距离印度非常遥远，并且当地人曾经杀死过一名来到这里的牧师，^①所以自从那次被人拜访之后，很多年过去都没有人再来这里。在摩洛哥群岛上，我给很多没有被洗礼的婴儿授洗。我在摩洛哥群岛上呆了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拜访了所有的基督徒村落。^②

沙勿略还对当地的自然状况以及民族特性进行了描述，他说道：

这些岛屿非常的危险，因为村民之间经常发动战争，他们是野蛮的民族。他们没有文字作品，更不会读写。他们会对自己所憎恶的人下毒药，他们用这种方式杀死了很多人。岛上的道路崎岖不平，所有的山都非常难攀越。他们缺乏赖以

^①在摩洛哥群岛中有一个村镇叫摩摩亚（Momoya），尽管它周围的村庄都已经接受伊斯兰教了，但是那里的居民却永远不会去信奉默默德教派。这个村镇的首领宁可作一个邪神崇拜者，也不愿意成为伊斯兰教徒。由于他的村庄常被撒拉逊人（Saracen，阿拉伯人的古称）骚扰，为此他求助于特尔纳特城的总督（Tristan d'Atayda），并答应总督，假如葡萄牙人能够保护他们，他和他的臣民们都将成为基督徒。总督顺利地接受了Momoya首领的提议，这位首领还亲自去了特尔纳特城，接受了洗礼，为了表示对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的敬意，取教名为约翰（John）。当首领从特尔纳特城返回时，还带了一位叫西蒙（Simao Vaz）的葡萄牙牧师随他一起回到摩摩亚，在那里西蒙神父使很多异教徒改宗信仰基督教。由于新入教的基督徒人数变得越来越多，另一个叫弗朗西斯·阿尔瓦雷兹（Francis Alvarez）的神父也来到这里协助西蒙神父，他们合作的很顺利，所有的摩摩亚人都放弃了邪神崇拜，接受入教，信仰基督耶稣。与此同时，特尔纳特总督曾许诺过派出的士兵也来到了摩摩亚，保卫这个村镇以免于撒拉逊人的袭击。但是，Boliefe国王的私生子对他母亲（Cacil Aerio）所施行的残酷暴行激怒了其他首领及毗邻的人们，因此，他们联合起来杀害了所有在他们住处能找到的葡萄牙人。摩摩亚的居民生性易变而残忍，他们由谋杀他们的第一个神父西蒙而开始了残酷的大屠杀；他们一边射箭一边追杀阿尔瓦雷兹神父到海边，如果不是神父意外地撞到了一个尖利的树皮，穿透了他的胸膛，他就已经被那些野蛮人杀死了，正是他身上的伤口把他从那些野蛮的基督徒手中救了过来。后来，撒拉逊人利用了这种混乱的局面，对摩摩亚城进行了大屠杀，使整个城再一次改宗。只有首领自己还坚持基督信仰，尽管他们对他施以酷刑和威胁。最后，特尔纳特总督又派了一个牧师去，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坚持下来。参见《The Life of St. Francis Xavier,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Apostle of the Indies and of Japan》, Written in French by Father Dominick Bobours, of the same Societ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Mr. Drrden, London, p235.

^②《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71.引文中提到的“在摩洛哥群岛上呆了三个月”，是指1546年9月13日到12月13日。

生存的粮食，他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谷物或者葡萄酒……岛上有很多的野猪。很多村庄都缺少可以饮用的淡水。岛上盛产水稻和许多的树，例如棕榈。岛上也有其他的一些树，人们用这些树的树皮做成身上所穿的衣服。我讲述这些主要是想让你知道，在这些岛上能够找到丰富的精神安慰；我欣然接受在岛上遇到的所有艰苦跋涉和危险，这些困难都是伟大精神安慰中的巨大财富。^①

他还提到了岛上的一个野蛮的、以杀人为乐的部落和一个经常爆发地震、火山的岛屿：

在群岛之中有一个部落叫做塔巴鲁（Tabaru）。这个部落里的人都是异教徒，他们在杀人中找到自己全部的快乐，据说，当他们没有其他人可杀的时候，经常会杀害自己的儿子或者妻子。他们杀害了很多基督徒……其中一个岛屿几乎总是地震，之所以这样是由于在这座岛上有一座持续喷出火焰和大量灰烬的山。^②

在这样一个充满天灾人祸的地方，沙勿略毫不畏惧地开始了传教之旅。沙勿略在摩洛加群岛登陆后，当地土著看到这些陌生人时，还以为他们是来为以前被他们杀死的葡萄牙人报仇的，于是他们马上逃跑了。沙勿略跟着他们进了茂密的森林，他用最温和的表情让这些野蛮人相信自己不是来找他们报仇的敌人。沙勿略用马来亚语言告诉他们自己此行的目的，^③他向这些土著人表达了自己全部的友善，跟着他们回了村庄。他发现那里大部分的居民都已经被洗礼了，但对于他们来说只剩下对洗礼的混乱的理解，他们的宗教只不过是默罕默德教派和邪神崇拜的混合。

于是，沙勿略开始了传教工作，他在穿过街道的时候大声唱着要理歌。然后，沙勿略用最适合他们粗俗的理解能力的方式，将要理歌解释给他们听，这样他们就很轻松地理解了。用这种方法，沙勿略使那些以前放弃了基督教信仰的人重新

^①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71.引文中提到的当地盛产棕榈树，棕榈树的存在反驳了沙勿略所描述的岛上缺乏食物的事实。事实上，棕榈树被早期传教士称为“马鲁古岛的谷仓”。另外，引文中提到的岛上的“人们用树皮做成身上所穿的衣服”，岛上的男人和女人的唯一的衣服就是用树的内皮做的缠腰带。参见《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71, 注 23 和注 24。

^②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72.引文中提到的“他们杀害了很多基督徒”，从 1539 年到 1551 年，济罗罗岛（印度尼西亚东北部哈马黑拉岛）和塔巴鲁（Tabaru）岛的伊斯兰教徒向摩洛群岛的基督徒发动了一场战争。另外，引文中提到的当地“有一座持续喷出火焰和大量灰烬的山”，当地人还向沙勿略详细讲述了火山爆发时的惨状，以及爆发后给当地造成的巨大灾难。但据称，沙勿略在那个部落的期间内，地震和火山都从未爆发过。参见《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72, 注 26。

^③ 在摩洛加群岛这一个地方，有很多种语言，即使是只有三里格的距离，人们也不能理解对方所说的话，但是马来亚语言在这里却是通用的。参见《The Life of St. Francis Xavier,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Apostle of the Indies and of Japan》，Written in French by Father Dominick Bobours, of the same Societ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Mr. Drrden, London, p245。

成为基督徒，并且劝服了那些拒绝信仰基督教的邪神崇拜者。

为了使这些新入教的，但却只有粗俗理解能力的基督徒能够按照基督教习俗过神圣的生活，沙勿略用永恒的惩罚来威胁他们，利用能看到的可怕的东西来让他们意识到什么是地狱。有时候，他把这些新入教者带到能够引发出他们慈悲之心的悬崖边上，那里有大量的燃烧着的石头随着火冲向天空，并伴随着狂烈的炮轰声；当人们看着这熊熊的火光，还有令天空变得昏暗的朦胧的烟尘时，沙勿略对他们解释道，在火的深渊中酝酿出的痛苦，不仅会施加在邪神崇拜者和伊斯兰教徒身上，还会施加给那些不按照自己信仰生活的人。沙勿略甚至告诉他们，那些燃烧的巨大的山口就是地狱喘息的地方。

沙勿略呆在摩洛加群岛的三个月内，他走遍了所有的城镇和村庄，所有新入教者的村镇都竖起了十字架，建立了教堂。摩洛加群岛最主要的城镇，特罗（Tolo），有 25000 人，那里所有的居民都改宗信仰基督教了。

可见，沙勿略不光是一个具有旺盛传教激情的狂热使徒，他还是能够灵活运用传教方法、具备过人智慧的传教士。面对这些野蛮的、无知的土著人，沙勿略没有像在印度那样着重于教授他们宗教要理和基督教义，而是针对当地土著人的特定状况，敏锐地抓住了他们最薄弱又最惧怕的地方，利用他们之所怕来威胁恐吓他们，以达到传教、或是令新入教者坚持信仰的目的。这是沙勿略在摩洛加群岛能够传教成功的关键所在。

在沙勿略乘船前往印度，途经一些小岛，首次遇到异教徒时，他还不清楚该如何面对异教徒的提问，也不知道该如何使他们改宗；在印度时，沙勿略也只是初出茅庐的传教士，那时他在传教策略上的改变或是出于无奈，或是考虑不周全；但是，此时的沙勿略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因地制宜的灵活策略了，他的做法已由无意识地作改变发展为有意识地作改变。虽然还没有形成完整成套的策略性方法，但这种有意识地改变仍具有重大意义，沙勿略在传教方法上的开创性实验为今后“文化适应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 日本的传教历程

4.1 马六甲初遇弥次郎

沙勿略之于日本，其地位正如利玛窦之于中国。他是第一个到日本传教的西方教士，但他的日本之行却颇为偶然。那时，有几个葡萄牙商人到过日本，他们讲起在海洋的另一端，有这样的一个国家，福音的真光还没有传到，而且那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民族，这种求知欲正是印度的异教徒所不具备的。于是，沙勿略的脑海里就马上有了远涉重洋，在这块肥沃的土壤上，播撒福音种子的计划。沙勿略在1548年1月20日，从科钦写给罗马的同伴的信中，说道：

所有去过日本的葡萄牙商人都告诉我，如果我能够去日本，我将为主做出巨大的贡献，这个贡献要比改宗印度异教徒更大，因为日本人非常的理智。以我的经验来看，尽管赴日之旅危险重重——主要是由于途中猛烈的暴风雨，以及这个海域上经常出没的中国海盗而导致很多船只被掠夺，但是不管是我还是耶稣会其他成员都将会在两年之内去日本。^①

1547年2月，沙勿略回到马六甲。1547年12月7日，在那里，经葡萄牙商人阿尔瓦雷斯（Alvarez, Jorge）^②的介绍，他第一次遇到了犯罪潜逃在外的日本鹿儿岛武士弥次郎。^③

沙勿略向弥次郎详细询问了日本的情况，他在1548年1月20日，从科钦写给罗马同伴的信中，说道：

我问弥次郎，如果我和他一起去他的国家的话，日本人是否会成为基督徒。弥次郎回答说，他国家的人们不会立即成为基督徒，而是会先询问很多问题，然

^①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78.

^② 阿尔瓦雷斯是葡萄牙远东贸易商船的船长。曾与平托（Mendes Pinto）一起在中国沿海经商，与沙勿略一直保持着长期的联系和私人友谊。1546年，他在日本萨摩山川港停泊时，将犯罪的弥次郎带到马六甲。后又应沙勿略的要求，于1547年写了《日本见闻记》（Descripcion de la tierra de Japan）。这份报告被认为是葡萄牙人有关日本的最早记录。沙勿略在1548年1月20日的信中称之为“非常值得信赖的人物。”并说“有几个葡萄牙商人向我提供了被称为日本诸岛的最近刚刚发现的非常大的岛屿的情况。”在同年11月29日的信中，他又说“我还见到了名为阿尔瓦雷斯的某条商船的船长的葡萄牙人。”《沙勿略全书简》，第272页。转引自，威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页。

^③ Anjiro，弥次郎大约生于1512年，他出生在鹿儿岛的一个贵族家庭。由于犯了杀人罪而非常的烦恼，所以他在1545年逃到了马六甲，并在第二年又一次来到这里。1548年，他在果阿受洗，教名为保禄。1549年，他跟着沙勿略的团队回到了日本鹿儿岛。在那里，他使大约一百多名日本人改宗；并且，在沙勿略不在日本期间，他是所有基督徒的首领。由于被发现的尸体所困扰，他加入了一个专门袭击并掠夺中国的日本人的队伍，并在一场战斗中死于那里。参见《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77, 注56.

后看我会怎样回答他们以及我信仰的是什么宗教，最重要的是，我的生活方式是否和我所说的话一致。假使我能做好两件事，也就是，如果我的回答能够使他们满意，并且能够忍受责备和羞辱，那么在大约半年之内人们就会慢慢地了解我，国王和贵族以及所有其他谨慎的人们都将会成为基督徒，因为，据弥次郎所说，他们是只受理智控制的民族。^①

弥次郎对日本人的描述极大地激发了沙勿略的传教热情。1548年1月，沙勿略回到印度，同时也将弥次郎带到印度，送入耶稣会设在果阿的圣保禄神学院学习，并委托神学院院长尼古拉·兰恰诺特(Nicolao Lancilloto)神父在教化弥次郎的同时，收集日本以及整个东亚的情报。^②

以后的十五个月里，沙勿略在果阿及南亚各群岛间来往，巩固他的传教事业，同时进行前往日本传教的准备工作（直到那时候，还没有一个欧洲传教士到过日本）。他在1548年1月20日，从科钦写给罗马同伴的信中，提到：“亲爱的神父和兄弟们，祈祷主保佑我们吧，因为已经有很多旅伴在去日本的旅途中丧生了。同时，弥次郎将会进一步学习葡萄牙语，并且将会逐渐了解印度和生活在那里的葡萄牙人，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这段时期，我们会在宗教信仰方面对弥次郎进行指导，还会把全部的基督教教义翻译成日文，这个译本会附有一些解释——也就是关于我主耶稣基督如何出现的历史的宗教论文，我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弥次郎的日本文字写得非常好。”^③

4.2 传教日本

1549年4月，沙勿略从果阿出发渡航日本。经过4个月的艰苦航行，8月15日终于在弥次郎的故乡鹿儿岛登陆，开始了他在日本的传教生涯。

一如以往，沙勿略每到一个新的传教地，便会积极地了解当地的状况。他在1549年11月5日从鹿儿岛写给果阿的同伴的信中，十分详细地进行了描述，他说道：

首先，就接触的范围而言，这个国家的人是我迄今发现的最好的国民。我想在异教徒之中，也许不会找到比日本人更优秀的人吧。他们是非常有礼貌的民族；

^①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78.

^② 由弥次郎叙述、兰恰诺特纪录、并不断增补的调查报告共有四份《第一日本情报》、《第二日本情报》、《第一日本情报第二稿》和《第一日本情报第三稿》，在1548年的夏天，递交给当时葡萄牙驻印度的总督加尔西亚·德·萨(Garcia de Sa)。参见岸野久：《西歌人的日本发现》，吉川弘文馆，1988年版，第102-103页。转引自，戚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9页，注3。

^③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178.

很容易接近，一般而言都很善良，没有什么恶意。他们的名誉观念强得叫人吃惊，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名誉更重要的了。他们大部分都相当贫穷，但不管是不是贵族，都不以贫为耻。

日本有一些其它基督教国家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不管是多么贫穷的贵族，平民都会对这些贫穷的贵族表示出同样的尊敬，就像对待那些富有的贵族一样，不管这位平民有多么富有。再贫穷的贵族也决不会和一个不是贵族的其它阶级的人结婚，即使他会被赠予很多的财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与低等级的人结婚会令他们失去名誉。因此，他们看重名誉胜于财富。在这个民族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非常谦卑而有礼貌。

日本人最不能容忍的是侮辱和轻蔑的话。所有的贵族都认为为领主服务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情，他们对领主也非常的顺从。我想，贵族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将会失去自己的名誉和等级，而并非是惧怕领主的惩罚。日本人在吃的方面很节制，但是他们却喜欢酗酒。因为这个地区没有葡萄树，所以日本人喝的是用米酿成的酒（日本米酒）。他们从不去赌博，因为日本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他们觉得通过赌博获得财物的人也将可能成为盗贼……在我到过的各地之中，不管是基督教国家，还是非基督教国家，没有比日本更憎恶盗贼的地方。日本人很少发誓，他们一旦发誓，便会以太阳为誓。很多人能阅读书籍，所以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领会祈祷文和教理。日本人都只有一个妻子。此地盗贼甚少，盗贼一旦被发觉，就会被处死。总之，日本人有着一坚定的意志力，善于交际并且求知欲强。^①

沙勿略对日本有着极好的第一印象，由于了解到日本人对于领主非常的顺从，所以沙勿略最初设想采取一条自上而下的传教方式。以他以往在印度及南亚群岛的经验看来，这是一个快捷而简便的传教方针，一旦成功，将会使统治者属下的广大区域全部改宗，从而迅速有效地实现传播福音的目的。

为此，“他计划到达该地后，立即访问日本国王和这一王国中众多领主居住的（京）都的宫廷，从国王那里获得在日本全境向所有希望接受我主教义的日本人传播教义的完整许可。为了谒见国王，携带了印度总督和主教阿尔博格（Albuquerque, Dom Joan）以及达·伽玛伯爵的儿子、马六甲长官西尔瓦（Sylua, Dom Pedro）的书信，并携有洋琴一台、时钟一个和其他物品，以便与使节的形象更为相称”。^②

登陆后，沙勿略一行立即拜访了地方长官和鹿儿岛领主岛津贵久，向他说明

^①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p297.

^② 罗德里格斯（Rodriguez, Joam）：《日本教会史》，下，岩波书店1979年第3版，第368页。转引自，戚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页。

了自己的使命。在这次会面之前，沙勿略肯定对日本混乱的政治局面有所了解，知道当时的人们已经不像以往那样服从天皇的命令。但是，沙勿略没有、也不可能立即修改他的传教计划。他固执地认为，居住在京都的天皇，依然是日本最高的正当君主，所以恳求领主将他送往京都，并提供去那儿的船只。虽然沙勿略在传教的过程中能够因地制宜，灵活地运用传教方法，但在个性上，他还是一个偏于固执的人。

在这次会面之后，沙勿略立即走上街头，开始用他一直以来所最习惯的方式开始传教。对此，《日本教会史》中有这样一段绘声绘色的详细描述：

在得到公爵（即岛津贵久，下同）的许可后，这些天国的使者们来到鹿儿岛街头，将福音的吉报带给日本人，就像圣灵降临日在耶路撒冷发生的情景一样。在那一日，充满圣灵的圣使徒们从橄榄山上下来，在耶路撒冷街头人们聚集的地方开始说教。（鹿儿岛发生的相同事件）令人惊讶，使某些人起了称赞的念头。神父强调造物主的伟大，阐明神子道成肉身的玄义，将圣子充满荣光、肉体 and 灵魂升天之日前的整个生涯告诉人们。他们还告诉观众，最终之日将进行善恶之人的审判，前者将获得其现世善业的报答，而给与后者的永久苦役，亦同样是对其罪恶的惩罚。神父还向他们指出了通往光荣、避免永久惩罚的真正道路。他说，对于想去天堂的人来说，它并不遥远。只要人们忏悔自己犯过的错误和走过的弯路。

日本人聚拢起来观看神父。为了听取神父的讲道，男人、女人和年轻人形成了人墙。

镇上有被称为福昌寺的宏伟寺院，它属于禅宗宗派的僧侣所有。寺院面前是广场，广场边有一座山门，与围绕着寺院的围墙相连，还有登上寺院的石级。神父来到那里，为了使大家看到他的形象，听到他的声音，他坐到石级的最高一层。他眼望天空，为了驱赶恶魔、不使它们妨碍圣言的效用，神父对自己和听众划了十字。神父打开用我们的文字（罗马字）书写的有关信仰玄义的书，高声朗读记于其中的玄义。书中的内容已经得到翻译，通译弥次郎向听众进行说明。在读到与圣使徒们宣教完全相同的神圣玄义时，神父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重复。

由于日本人与生俱来的傲慢心理，说教者的教理、风度、服装、容貌、奇特的动作以及用他们从未听过的语言读书时的奇妙发音，使他们起了轻蔑和揶揄的心情。有人大笑。还有人说“我不懂这伙人说的东西”。还有人嘲笑、辱骂神父说出的语词。“这个家伙说的真是老糊涂的昏话。”还有人问弥次郎，“这个男人神经正常吗？他不是胡说八道吧？”^①

^① 《日本教会史》，下，第369-371页。转引自，威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2-34页。

显然，面对这样一个具有一定文化传统的民族，沙勿略遇到了比在印度和南亚群岛更多的困难。虽然有弥次郎作翻译，但外国人的奇特外貌和古怪发音，以及前所未闻的神学教义，仍不免引起日本人的围观和嘲弄。为了弥补语言能力的不足，更为准确地传达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沙勿略还在弥次郎的帮助下，用日语译写了最初的教理书。在最初的传教中，弥次郎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在不长的时间里，鹿儿岛的基督教信徒就发展到百余人。

在日本当时的环境下，领主的保护十分重要。与耶稣会传教士在美洲或太平洋岛屿等传教地的情况不同，日本是一个有着严格等级制度的封建国家，要在这样的国家中传播新的外来宗教，能否获得地方实权派人物的保护，显然成为外国传教士能否立足或生存的关键所在；而如何获得他们的保护成为能否进行传教的重要前提。对于这一点，沙勿略未必没有清醒而足够的认识，只是个性上偏于固执的他一直不肯放弃自上而下的传教理想，总是梦想着能够使天皇皈依基督教，从而一举使传教获得成功，直到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之后，他才不得不适度调整这一过于天真而又不切实际的传教方针。

4.3 传教受阻

1543年葡萄牙人来到日本之后，日葡贸易以及通过葡人居间进行的日中贸易稳步发展。日本不少领主因此而获益匪浅。另外，由于当时的日本处于战乱之中，葡人带来的先进武器深受这些领主的欢迎。正因为这些人有求于葡人，所以他们对作为葡萄牙国王特派教士的沙勿略及其传教活动也持一种默许，甚至是支持的态度。例如沙勿略访问山口时，向领主大内义隆献上了大量的礼物，其中有钟表、八音盒、步枪、望远镜、锦缎、葡萄酒、书画等，大内大喜过望，立即批准了他的传教请求，还送给神父及其从者一座寺院用以栖身。

然而，沙勿略的传教活动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在宗教信仰上，传教士遇到了来自日本佛教众多门派的威胁。但是最初，情况并非这样。由于缺乏对基督教及其教义的认识，日本僧侣甚至一度将这些来自印度的异国修士视为同道，并对他们表示欢迎。但是，这种和平共处的祥和气氛很快便被打破。因为，僧侣们从传教士们在日本获得的越来越多的支持中看出，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他们自己离被本国人抛弃、轻视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如果真是那样，自己的寺院就不会有人来访问，或是被人捣毁，寄进物也越来越少，自己的神佛偶像会被破坏。^①因此，他们由最初的欢迎变成了愤怒和嫉妒。佛教僧侣群起而攻之，甚至不惜对沙勿略进行中伤和迫害。

^① 《日本教会史》，下，第389-390页。转引自，威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6页。

在这场宗教的较量中，日本地方领主岛津贵久的态度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对此，传教士曾经记载过：

所有地方都掀起了亵渎我主教义的风暴。对于三位同行者，起了数不清的谣言和谎话，出现了无数的虚伪证言。他们说神父是被自己国家和故乡流放出来、将这里作为立足点的流浪者。他们在所到之处寻找空隙，欺骗头脑简单的人。还有人說他们食用人类。为了使民众相信这一指控，他们夜里在神父们居住的地方扔下带血的布块。他们不允许民众集合到广场听神父们讲话，只要神父们出现在那里，就会不停地发出骂声和尖利笑声。还投掷石块攻击他们，向神父的屋顶和窗口扔石子。但是，都市官员根据从领主那儿接受的指示，帮助了神父。结果僧侣们前往领主那儿请愿，对允许神父们自由传教表示严重抗议，试图用一切手段和方法将神父们赶出日本。^①

可见，传教士们对于当时的势力对比和此中内幕，心中非常地清楚。因为，岛津贵久十分明确地表示，招来葡萄牙商船就是传教士们获得传教许可的唯一筹码。即便如此，沙勿略还是念念不忘进京说服国王的企图。最后，他还是没能实现对领主岛津贵久所许下的诺言。而岛津贵久在希望破灭后立即翻脸，下令将所有接受神父教义的人处以死刑。

形势大变，神父们已不能像以往那样公开传教，也没有人再来听取他们的布道，一年多的传教成果顷刻化为泡影，沙勿略丧失了苦心经营的鹿儿岛传教基地。但是，这一打击反而激发了沙勿略义无反顾地去实现自己最初的想法——前往京都，改宗天皇。

1550年6月，沙勿略将弥次郎留在鹿儿岛，带着托雷斯神父、费尔南德斯修士和另外两位日本信徒，取道平户、山口，开始了前往京都的漫长旅行。可是，京都正处在战国末年混战之中，一片荒凉，天皇只是徒具虚名，京都地区的大权掌握在实力派武将三好长庆手中。京都之行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使得沙勿略对日本的政治现状有了更为清醒地认识和实际体验，并迫使他调整以往过于理想化的传教策略。

此时，沙勿略真正体现了他作为远东传教事业开创者的过人之处，即，他能够根据传教地的实际情况，适时地调整不切实际的传教方法，从而制定出符合实际、能满足各方需要的传教方针。自上而下的传教方针没有变，但面向的统治阶级和工作的主要对象已从一厢情愿的日本皇室，转向称霸一方的地方大名，他希望先在日本某一地区取得传教上的突破和成功，进而将范围扩大到整个日本；而且沙勿略也意识到了，与葡萄牙商人的交易，才是打开传教局面，获得传教许可

^① 《日本教会史》，下，第391页。转引自，威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6页。

的主要策略。许多地方领主也向沙勿略等人伸出了欢迎之手，后来，沙勿略在平户港、山口、府内陆续取得了传教的成功。

4.4 传教方法分析比较

纵观沙勿略的传教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他能获得传教成功的关键一点就是，因地制宜，审时度势，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以达到传教改宗的目的。沙勿略每一次传教所采用的策略都是对下一次福音传播的准备和方法积累，每到一个新的传教地，他便会使用自己所熟悉惯用而又取得过明显成效的方法，而当传教遇到瓶颈时，他又能及时地改变策略，根据当地特殊情况和自己的判断做出改变。从无奈地选择，到主动地选择，这其中无不体现沙勿略的智慧和胆识。

最初，沙勿略刚到印度时，对远东的各方面形势还没有深刻而亲身的体验，那时他所使用的传教方法，大部分是模仿《圣经》中耶稣以及其他使徒的做法，如街头传教，为儿童洗礼，为麻风病人作祈祷，救治将死孕妇等行为。这是一个年轻的神父刚刚踏上传教岗位，出于自身强烈的宗教情怀和对耶稣基督及其使徒的崇拜，而做出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大部分神父所采用的传教方法。经过一系列传教经验的积累，针对果阿当地基督教信仰的混乱状态，沙勿略开始了基督教教义的编写工作，改编了《小公教要理书》；努力学习当地语言，并将祈祷文翻译成当地语言。这些工作对于沙勿略能够顺利而又深入地传播福音是至关重要的，也为他后来在南亚群岛以及日本的传教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在印度这样一个土邦国家林立，没有世俗政权压力，甚至可以说整个国家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的松散的国家里，沙勿略只是一个年轻、不太成熟的传教士；那么，在马六甲、安汶岛及摩洛哥群岛等南亚群岛，沙勿略已经是一个传教的“熟练工”了。他能够驾轻就熟地运用各种方法来“征服”当地野蛮的土著人，他灵活地运用各种政治势力间利益的交换，实现最终传教的目的。这些方法甚至包括利用土著人的无知来威胁恐吓他们，用一些食物来吸引他们，以令他们能够改宗。事实上，沙勿略在这里的传教是重量而不重质的，它只能在数量和规模上扩大基督教的影响，而没有在实质上做到福音的传播。很多时候，实质的传教活动只是传教士们心中的幻觉，传教地的人们并没有太多的认同。但在那样一个野人出没的地方，能够达到沙勿略的成果，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日本的情形和印度、南亚群岛完全不同。它具有高度发达的封建政体，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自身独特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岛国的地理特征使得日本对外贸易发达，能够接触到很多不同地方的文化风俗，因此它在文化传统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这导致了沙勿略在初到日本时，对日本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好感。例

如，沙勿略刚到日本时，对日本人的印象非常之好，也在信中写了很多对日本的夸赞之词，他认为日本是非常有理智的民族；而事实上，日本的情况并非完全是他所描述的那样，日本人也并非是那么有理智的民族。沙勿略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就是由于日本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状况之于印度和南亚群岛来说，是非常发达而进步的。

沙勿略的每一次传教之旅都是他丰富自身传教策略的过程，他会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的政治体制下，采用不同的方式，这便是他的开先例性之所在。当沙勿略来到日本之时，日本正处于战国阶段，全国上下政权纷争，一片混乱，天皇地位有名无实。在这种情况下，当沙勿略再一次采用他所惯用的传教方法，以及面向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传教策略时，他自然而然地要遭受到挫折。然而沙勿略再一次发挥了才智，他及时地修正了过去不切实际的方法，利用世俗利益作为打开传教之门的主要武器，将工作的主要对象变为握有实权的地方首领。

这是沙勿略传教策略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这种曲线传教的核心精神不仅与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方式有着显而易见的承嗣关系，而且对后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

^① 参见威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8页。

第五章 传教中国的努力

5.1 离开日本

1551年11月，沙勿略忽然离开了日本，携府内领主大友义镇的使者和另外四位日本教徒，取道马六甲返回了印度果阿。

沙勿略突然离开日本的决定也显得过于仓促。经过两年左右的艰苦努力，传教士们已经获得四国大名大内义隆和大友义镇的传教许可，并在鹿儿岛、山口和平户等地拥有了第一批日本信徒。此外，他们已经与前往平户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建立起联系，并获得了他们在各方面的有力支持。应该说，耶稣会士在日本的传教工作已经打开局面，并正欣欣向荣地向前发展。在这一情境中，沙勿略的突然离去，更显得过于突兀。

对此，人们有种种猜测。有人认为，导致沙勿略此举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耶稣会在山口和府内的良好开端，使他对日本传教事业的发展前景感到乐观；也有人认为，传教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得传教士人手不够的困难突出起来，沙勿略想返回耶稣会在果阿的大本营，挑选更多的合适人选来传教。除了以上种种推测，从沙勿略后来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确定，庞大的中华帝国传教计划已经开始了。

返回印度后，情绪亢奋的沙勿略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准备工作。在返回科钦不到一个月后的2月15日，沙勿略抵达印度教区的总部果阿，二个月后的4月14日，他重返科钦，同月25日，沙勿略离开科钦，前往马六甲，开始了他最后的冒险。如果我们将这一行程与他二年前的日本之行作一番比较，便会发现，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冲向上帝为他安排的最后归宿。在滞留印度的最后三个月中，沙勿略的日程极为繁忙紧张，其中的工作包括在各地修道院中的讲演，为中国之行挑选志愿者、向商人募集资金，安排印度教区及神学院的各种杂务。

5.2 对中国的认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沙勿略的准备都不够充分，他对中国的了解极为浅薄而有限，所有相关知识都来自他在日本的间接体验以及葡萄牙商人的介绍。

我们不清楚沙勿略获取中国信息的最初时间与具体地点，但依常理推断，在传教印度的3年期间，早在半世纪前就抵达中国，频繁往返于中印航线、并在中国沿海岛屿建立起某些贸易据点的葡萄牙商人，会向果阿当局报告他们在中国的

所见所闻，而这些报告在并不太大的果阿城中，被沙勿略获悉是合乎情理的。^①

1545年9月，沙勿略首次抵达马六甲，在此逗留了4个多月，直到1546年元旦，才前往摩洛加群岛的安汶岛（Amboina）。在这更靠近中国、曾为中国属地的南亚港口城市，穿梭往返于此的葡萄牙商人向他提供了更多细节的切身感受。1546年5月10日，沙勿略在安汶岛写给欧洲耶稣会士的信中说道：

我在Malacca（马六甲）时遇到了一个从被称为中国的国度来的一位葡萄牙商人，他在那里进行了重要交易。他说，从中国宫廷来的许多中国人向他提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基督徒是否吃猪肉。葡萄牙人回答说：“是的，吃猪肉。”然后问道，为什么提这样的问题。那个中国人回答说，有许多人居住在山区，远离其他民族。他们不吃猪肉，还遵守各种各样的祭典。……

每年有许多的葡萄牙船从马六甲前往中国的港口。我向了解这个民族的许多人打听他们中间所遵守的祭祀与习惯等许多事。这是为了判断他们是否是基督徒，是否是犹太人。很多人都说使徒圣多马去了中国，使许多人成了信徒。他们还说希腊教会在葡萄牙人统治印度的很早之前，使徒圣多马及其弟子曾为了向在印度向成为信徒的子孙们传授教理而派遣主教来行洗礼。有一个主教（马尔·雅各布斯）在葡萄牙人征服印度时，从他的故国来到印度。他后来从印度遇到的主教那里听说圣多马去往中国（在那里获得了信徒）的事。如果这是确实的，那么我将在来年报告此事。^②

沙勿略此信很可能是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最初记录之一。经过两年多的深入调查，沙勿略于1548年向印度总督加尔西亚（Garcia de Sá）递交了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专题报告，并着重谈了以下七个问题：

- 一，中国是否存在基督教；
- 二，中国是否敌视传教的外国学者（传教士）；
- 三，中国是否有传授专业知识的学校；
- 四，学者们是否受到人们的尊敬；

^① 根据张天泽先生的研究，最早到达马六甲的葡萄牙商人是迪奥戈·洛佩斯（Diego Lopes de Sequeira），他在1509年9月11日首次来到马六甲，发现港内停着三、四艘中国帆船，但未能与他们接触。1517年7月1日，阿方索·德·阿尔布奎克（Affonso de Albuquerque）的舰队来到马六甲，并在进攻马六甲的战斗中得到了他们的帮助。葡萄牙人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514年。那一年，若阿·阿尔瓦雷斯（Jorge Alvares）的船队来到了中国的上川岛，并在那里为“发现”中国立了一根纪念石柱。1517年8月15日，费尔南·佩雷期·德安德拉德（Fernao Peres d'Andrade）率领一支舰队再次抵达上川岛，在经过了一番周折之后，取得了中国当局的信任，并建立起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但是，这些成果很快在1519年被西芒·德安德拉德（Simao d'Andrade）在广州的胡作非为给毁掉了。1521年，葡萄牙人与中国政府在广州发生冲突，中国政府驱逐了那里进行贸易的葡萄牙商人。但在此后的30年间，葡萄牙商人一直在广东、福建和浙江沿海从事走私活动，并在宁波双屿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的贸易基地。关于1542年被中国政府摧毁双屿基地，史学家们有不同的解释，但无论如何，它在存在足以证明中葡贸易的延续与规模。参见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华书局，1988。

^② 沙勿略：《沙勿略全书简》，第239-240页。

五，中国人的婚姻状况；

六，中国境内是否居住着外国人；

七，中国是否有被魔鬼缠身的人。^①

并且，随着沙勿略确定下一个传教目标后，他对中国的评价发生了明显变化，对中国的褒奖之词越来越多。他努力拼合起他所知道的各种传闻，热情地赞美即将前往的神秘国度。1552年1月29日，返回印度科钦仅半个月的沙勿略在写给一位欧洲耶稣会士的长信中说：

中国在日本的附近。如前所述，（日本的）诸宗派是从中国传来的。中国是很大的国家，和平，绝无战争。根据在那里的葡萄牙人信件，那是个正义极受尊重的国家，是任何基督教国家都没有的正义的国家。根据我在日本及其他地方的体会，中国人极为敏锐，富有才能，比日本人更优秀，是有学问的人。

所有人都说，中国在宏伟构想下得到很好的治理，大城市里住了许多人，房屋是雕刻精美的石头制成，有许多丝绸，是非常富裕的国家。根据得自于中国人的知识，在中国，许多人分属于不同的宗教，根据我获得的情报，其中还有伊斯兰教徒与犹太人。有没有基督徒我不清楚。

我想在这个（15）52年去中国国王所在的地方。因为那里是可以弘布我主耶稣基督的教义的国家。如果那国的人们接受了教义，无疑会有助于日本的人们对他们所信的诸宗派产生巨大的怀疑。这么说，是因为中国的一个主要城市宁波离日本只有80里格。^②

虽然沙勿略对于传教中国有着如此狂热的冲动，但他实际上真实拥有的唯一资本，只有他对于上帝的坚定信仰、传播福音的狂热以及在印度、摩洛哥群岛和日本的传教经验。客观地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沙勿略的计划实现的可能很小。由于此前中葡两国的一系列冲突，明朝政府闭关锁国的严厉禁令，使得外国人无法进入。众所周知，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使团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以失败告终。此后1522年的西草湾之战、1548年的双屿之战和1549年的走马溪之战，又使中葡关系陷入最低点。明朝政府厉行海禁，游弋于中国沿海的葡萄牙商船只能进行偷偷摸摸的海上走私。而少数冒险进入中国内地的葡萄牙商人，则大都被投入牢狱。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进入中国，并且大张旗鼓地宣传福音，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如果阿修院中年轻修士们的直觉，这只会导致殉教。

^① 沙勿略的这份报告后来被收入《关于印度、日本诸事的记录》，成为该书的第19章，名为《由某人送给弗朗西斯科神父的有关中国的报告》。转引自戚印平：《东亚近世耶稣会史论集》，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第10页。

^② 沙勿略：《沙勿略全书简》，第543—544页。

5.3 生命的终点

沙勿略的旅途困难重重，在离开科钦后不久，船队首先便遭到风暴。到达马六甲港时，马六甲要塞的海军阿尔瓦罗（Atayde, Dom Alvarode）因私人恩怨，扣押了迪奥戈·佩雷拉（Diego Pereira）的船舵，随后又不顾沙勿略破门令的威胁，扣下了准备运往中国的胡椒等货物。阿尔瓦罗的公报私仇使得沙勿略苦心经营的整个计划陷于流产。

然而，沙勿略还是在 1552 年 8 月不顾一切地来到澳门附近的上川岛，为他的理想做最后一搏。虽然他尽了所有的努力，但却始终未能进入中国。那一年的 12 月 3 日，绝望而无奈的沙勿略因病在上川岛去世。临终时，只有他的中国仆人守候在身边。

关于沙勿略传教中国的努力及其历史意义，我们至少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沙勿略留给传教士的遗产并非仅限于进入中国的强烈意愿，他在日本的传教期间对于中国文化的体认，为罗明坚、利玛窦以及范礼安等人的创造性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他在行为方式上的诸多尝试，亦与范礼安此后的文化适应政策，有着明显的承嗣关系。

其次，沙勿略近乎于狂热的宗教激情与献身精神，一直是此后众多传教士效法的榜样。虽然沙勿略始终未能进入中国内地，但他的勇敢尝试和未竟梦想，却一直是激励耶稣会传教士进军中国的动力源泉。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传教圣人的沙勿略成了一种精神象征。

结语

传教策略是传教士能否取得传教成功的关键，同时，传教策略的择用与发展也是备受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一般来说，传教策略是特定历史情境中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传教士自身文化传统和行为方式的体现。沙勿略作为耶稣会亚洲传教事业的奠基人，他的许多传教方法值得后人重视和研究。

首先，经过一段时间传教经验的积累，沙勿略逐渐感受到语言在传教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也产生了对待教理书的态度上的变化。由最初在印度选用现成的葡文教理书，到后来在南亚群岛组织人员翻译教理书，再到最后于日本决定用日文编选一本适合当地的教理书，虽然其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教义的错误理解，但是它昭示了沙勿略对语言运用的逐渐重视和不断改进，也是沙勿略传教方法的创新之处。这种做法对后来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日益深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次，沙勿略能够根据每个传教地特殊的现实环境，对自己的传教方法做出相应的改变，例如，在印度时曾提出更改四旬斋日期，在日本自上而下的传教方法受挫时，主动改变了传教对象，这都说明沙勿略的传教方法在不断地走向成熟，虽然没有完整成套的策略，但是已体现出“文化适应政策”的端倪；最后，沙勿略能够灵活、有效地利用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在平衡利益同时，为自己传教的最终目的服务。

这些传教方法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们的使用是没有前人经验可循的，是开创性的，这也就是沙勿略能被称为耶稣会亚洲传教活动创始人和奠基人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Joseph Costelloe, S.J., 1992,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Missouri.
2. 《The Life of St. Francis Xavier,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Apostle of the Indies and of Japan》, Written in French by Father Dominick Bobours, of the same Societ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Mr. Drrden, London.
3. James Brodrick, S.J.: 《The Origin of the Jesuits》, Longmans, Green and Co., London, New York, Toronto.
4. Josef Franz Schutte, S.J. valignano's mission principles for Japan, part I: The Problem, part II: The solution, Translated by John J. Coyne, S.J.
5. 戚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03。
6. 戚印平:《东亚近世耶稣会史论集》, 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04。
7. 倪准:《圣方济各沙勿略传》, 上海慈母堂活板, 1896。
8. [法]埃德蒙·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 张茄萍、勾永东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9. 《圣经》, 新标准修订版, 简化字和合本,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0。
10. 沙勿略:《沙勿略全书简》, 河野纯德译, 平凡社, 1985。
11. 《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 第三期, 第一卷, 同朋舍, 1991。
12. [法]裴化行:《利玛窦评传》, 管震湖译, 商务印书馆, 1993。
13.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 中华书局, 1983。
14. 康志杰:《基督教的礼仪节日》,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
15. 《基督教文化百科全书》, 济南出版社, 1991。
16. 陈钦庄:《基督教简史》, 人民出版社, 2004。
17.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8.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

19. 孙尚杨：《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
20. 何光沪、许志伟：《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1. 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文化学刊》（1999 第 1 辑），东方出版社，1999。
22. 许志伟、赵敦华：《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3. 杜赫德：《耶稣会士书简集》，第一卷，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大象出版社，2001。
24. 施密特（Alvin Schmidt）：《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汪晓丹、赵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5. [法]J·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26. 卓新平、许志伟：《基督宗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7. 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钱江译，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98 年。

作者：[田茹晶](#)
学位授予单位：[浙江大学](#)

相似文献(5条)

1. 期刊论文 [王冬青](#) [明代耶稣会在华传教中的日本经验](#) -[云南社会科学](#)2008, "" (1)

有别于天主教在非洲、拉美等地用武力推行传教的策略,在明代中叶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强调,传教要“适应”东方的文化风俗和政治环境,用和平的方式在东亚推广天主教。沙勿略、范礼安等人是16世纪中期和后期耶稣会在东亚传教的重要人物,他们在日本的传教经历为在华推行“适应”传教策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换言之,在中国所谓成功的“利玛窦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早期耶稣会士在日本的传教经验。

2. 期刊论文 [刘钧艳](#), [LIU Jun-yan](#) [中日两国接受西学途径之差异——关于适应主义策略差异的探讨](#)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28 (6)

适应主义策略是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东方传播天主教的重要方法之一。适应主义在中日两国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针对对象:日本的平民阶层和中国士大夫群体。适应策略在中日两国工作对象的差异,是导致中国缺乏类似日本兰学阶段的原因之一。

3. 学位论文 [林超](#) [基督教在日本的早期传播](#) 2008

1517年,马丁·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沉重打击了西欧基督教王国中原先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罗马教廷。为了抵制新教的影响,罗马教廷开始大规模向外传教。1549年,罗马天主教由耶稣会修士方济各·沙勿略传入日本,17世纪中期被江户幕府彻底禁绝。虽然罗马天主教在日本只传播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却给传统的日本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因此,本文所介绍的基督教在日本的早期传播特指的是罗马天主教在日本的早期传教活动。

本文主要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基督教传入日本的历史背景,从中可以了解到基督教传入日本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第二部分再现基督教在日本早期传播的百年历史,经历了最初的探索、发展直至高潮,最后终于衰落这四个阶段,详细的描述基督教与传统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亲密接触。

第三部分着重描述分析基督教在日传播的历史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与日本传统势力和文化道德理念所产生的冲突。

第四部分主要分析基督教在日本传播的百年里给日本的社会文化、历史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

本文通过对基督教最初在日本传播历史的描述分析,说明了基督教文化对日本原有的宗教信仰、经济利益、价值观念、世俗权力造成的巨大冲击,并且对日本今后二百多年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导致了日本近代“锁国”体制的形成。

4. 期刊论文 [顾卫民](#) [印度果阿访问记\(二\) 旧果阿的好耶稣教堂](#) -[世界宗教文化](#)2007, "" (1)

在果阿的许多教堂之中,“好耶稣教堂(Bom Jesus)”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它建于1594年,完成于1650年,它的设计师是斐南得斯(Domíngos Fernandes),该教堂因保存了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的遗体而在天主教世界中享有盛誉,1946年当时的教宗庇护十二世册封为巴西利卡圣殿。“Bom Jesus”在葡文中意谓“好耶稣”(The Good Jesus)。

5. 学位论文 [蒋旻](#) [早期来华传教士传译故事述考](#) 2006

从1552年西班牙耶稣会士沙勿略受教会派遣来华开始,一直到1775年在华耶稣会接罗马教廷命令正式解散,早期来华传教士在华传教时间长达二百余年,他们在宣传天主教义的同时也传入了西方文明。本文以传教士宣传教理时为证道而译述、引用的各类故事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考察传译故事的类型、出处、翻译后的变化,给出传译故事的大致轮廓。

论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节对现存收有传译故事的史料与学界对传译故事的研究现状作了梳理。第二节将传译故事从内容上分三种类型进行探讨:道德劝戒类、教义阐释类和圣象圣迹类。第三节通过早期传译故事的明清翻译与这些故事的现代译本进行比照,指出明末清初传入故事的原型出处,以及明末清初传教士翻译与现代翻译间的差别。第四节探讨了传译故事传入后的影响,主要分析对中国寓言创作的影响。

论文最后附有传译故事目录,目录以《天主教东传文献》及其《续编》、《三编》,《天学初函》这两套丛书为对象,列出其中的传译故事。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23776.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4279cee7-efae-4ded-8747-9e4d00746cd8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